

# 走向田園境界的陶潛

主持：陳逢源 教授

## 主持人陳逢源老師：

陳引馳教授，還有遠道而來的各位學界前輩、先生，以及各位老師們，還有我們系上很多同學，大家早安。今天是我們王夢鷗講座的第二場講座，由我來擔任主持。王夢鷗王老師的講座在我們系上是最具有學術指標的講座，因為要感念王老師對我們學系的貢獻。相關的資訊，第一場廖棟樑老師都有闡述與說明，我這邊就不再重複，有關陳引馳老師的學術，我想廖老師也都有介紹。要跟大家說明的是，陳引馳教授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之前因為「跨越與開放」的關係，已經跟陳老師有很好的交誼、往來。更重要的是我們從陳老師身上看到篤實謙和的學者風範，陳老師的學術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對於老莊道家、佛學都非常地兼善嫻熟。我們可以理解這代表的是，取徑要廣、設定要鑽，做學術研究一定要有這樣的企圖心和氣魄，一定要讓視野非常開闊、研究非常專注。我非常榮幸、開心，也與有榮焉在第二場擔任主持，介紹陳老師要報告的第二篇專題——陶潛，走向田園境界的詩人。作為一個詩人的生命史的梳理和介紹，可以和大家分享很多的觀察和心得，那時間

有限，把時間交給陳教授，謝謝！

### 陳引馳教授：

謝謝陳逢源主任的介紹，都是非常美好的言辭，過譽了，我盡量努力。

我今天講的是「走向田園境界的陶潛」。第一次報告的時候，我講到老莊、道家的思想在魏晉時代的迴響，其實也都提到了陶淵明，在那個脈絡裡面來看，陶淵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詩人，也是一個文學家，我今天想講的是另外的一個方面，以現在看起來的話，陶潛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具有典範意義的詩人。但如果要考慮到那個時代的真實狀況，我的想法和現在很多學者可能略微有些不同。所謂「走向田園的陶淵明」，我想講的不是陶淵明的田園境界，而是陶淵明作為這樣一個詩人，而且是非常有自己思想能力，有自己精神世界的詩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田園？實際的生活經驗是怎麼樣？我想做的是這樣的梳理。而為什麼選田園？我想田園基本上是凝聚了陶淵明現實生活、人生追求，包括他的詩學成就，可以說是他人生的焦點。他實際生活的選擇最後是歸隱田園，他最後的人生追求、生命意義是在田園裡面，起碼他自己認為他在田園當中得到實現。他本身在詩學上面、在六朝詩史上面來講，他建立了田園詩這樣的類型，之後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可以說是一個焦點，所以還是會講到田園。

我下面會用幾個方面來講，一般認為六朝時代的文學家，或是

說文學現象，需要從幾個方面來考察，這幾個方面需要結合在一起看，一個是政治，第二個是家族，第三個是信仰，第四個是文學。這四個方面我想是交織在一起，很難釐清，如果只看文學，可能不瞭解當時的實際生活。當時的實際生活，當然我們要先瞭解他的生平活動、政治經歷，而在那個時代非常重要的是家族的問題。有學者認為那是一個貴族社會，家族的影響非常重要。當然還有信仰，個人對於道家、對於佛教有興趣，這確實在陶淵明的詩當中都有痕跡，這幾個方面我想是要綜合考慮的。而如果要觀察的話，其實我覺得可以從這四個維度觀察，很多詩人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考察，包括謝靈運、謝朓，之後的沈約、庾信，這些重要的詩人都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觀察。我在這樣交相錯綜的構造當中來討論，詩人走向田園境界的過程當中，如何經歷世間怎樣種種的曲折和不如意，對他歸隱田園的背景作一個新的描繪。

大家都知道，陶淵明在傳統詩歌史上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雖然當初在《詩品》裡面僅列為中品，但是後來慢慢就取代了在《詩品》當中地位非常高、「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的曹植和並世的謝靈運。當時在整個詩壇、文化世界當中，謝靈運比陶淵明要高很多，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最後他成為唐代之前最大的詩人，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田園詩。他創作田園詩這樣一個詩歌類型，構成田園境界。所謂田園的表現，在他之前的文學作品當中不是沒有，比如說《詩經》的農事詩，比方說東漢後期的賦、文章。陶淵明最重要的、具有開啟的地位在於：他給與田園意義，使田園成為他生

命的寄寓、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今天主要講的是，他這樣的境界是如何構成的？前面提到要從政治、文學、家族、信仰四個維度來觀察的話，我首先想從政治的方面，或是從他個人來講，就是他生平仕途這方面來考慮。

## 一、仕途

陶淵明最重要的，就是他棄官而去，離開滾滾紅塵的官場，走向田園，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最後在彭澤棄官而去的故事。這實際上記載是有不一樣的，《宋書·隱逸傳》上記載是：「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然後他就棄官而去了，這是一個情況；陶淵明在他自己的〈歸去來兮辭〉的序裡面講的並不完全是這樣，他講的比較坦白，他自序家裡很窮，「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因為家境貧苦，所以「見用於小邑」，實際上是為了謀生，他說「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所以最後說要離開。這時候正好「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說法，但是這兩者是有差別的。在《宋書》的記載裡面，陶淵明有一個更戲劇性的動作，但在陶淵明自己〈歸去來兮辭〉的序裡面，他給出了一個理由，就是質性自然，我要依循我的本性來做，有這樣的差別。這當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人的生命當中他很重要的轉折點，都有一個象徵性的、戲劇性的行為，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去看陶淵明的生活，這其實不是他第一次。根據學者的研究，綜合歷代的研究，實

際上陶淵明一生有五次的出仕經歷，而這一次彭澤令的棄官而去，實際上是第五次。所以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恐怕不是這第五次，這第五次只是一個象徵性的，重要的是在那之前，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他之前的情況。

陶淵明的生平有很多的爭論，從大體上來觀察一共有五次仕途經歷，從通常的見解來看，第一次出仕大概是他三十歲不到的時候，〈飲酒〉詩中說「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向立年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近三十歲時第一次出仕。這一次出仕，根據《宋書·陶潛傳》中記載「起為州祭酒」，擔任他的家鄉江州祭酒，「不堪吏職」，沒有辦法適應官場，所以他就解職，「少日自解歸」。這是什麼理由我們不清楚，他也沒有給出理由，史書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按照當時時間來推算，當時江州刺史是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兒子，算很有身分的人，這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像研究陶淵明非常重要的學者逯欽立先生就認為陶淵明是不屑於王凝之而離職，這也不一定確定，有很多都是推理。這次仕途的經歷肯定是非常短的，史書中也是這樣講，而且整個情況都不太清楚，他本人的詩當中沒有留下太多的痕跡，但肯定是他主動離開，這是第一次。值得觀察的是，他當時擔任江州祭酒，是由州府辟命，這和下面提到的有點關係，陶淵明的身分、他的家族、他本人當時所處的地位是不高的，如果說文學史上時常將陶淵明和謝靈運相比，看謝靈運就知道，是高門貴族，他一起官就進入政治中央核心，陶淵明則是擔任地方上的職位。所以我認為陶淵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前

途的，因為在那樣的貴族、門閥政治的格局當中，他是不可能地位的。這可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如果多一點推理的話，陶淵明有不同於流俗的自我定位，他當然實際上的地位並不高，從他起官開始，就看得出來他實際地位並不高，但是他對自我的期許是高的，所以他不耐這個吏事繁雜甩手而去，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經歷，是在當時先是江州刺史、然後是荊州刺史的桓玄麾下任職，這是近現代學者非常重要的論述。因為以前在歷史記載中，是非常曖昧的，很少提到這一點。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原因呢？我推考，大家知道桓玄的經歷，當時荊州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傅樂成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荊州與六朝政局〉討論，在南朝時候，荊州從東吳以下，佔有南方的半壁江山，所以掌握荊州，對下游建康這一帶，造成很大的壓力，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連串的事實。在東晉的時候，桓玄是非常重要的，在荊州那裡經營，和中央構成一個對抗的體系。桓玄當然也是非常厲害的人物，是桓溫的小兒子，最後他起兵進建康，殺了司馬元顯等，先是掌握權力，後來自立為楚，最後被劉裕滅掉了。可能有這個原因，所以大家後來都不太說，傳統認為陶淵明忠於晉室，所以入宋以後是抵抗的，但是事實情況是非常複雜的。因為如果要樹立陶淵明這樣的形象，他是忠於東晉，曾經在桓玄底下做事，且一生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和桓玄的關係，在政治上最重要、五次出仕中時間最長的就是這一次，保守估計有兩年，更加樂觀的看法甚至跨了三年。這樣的話，他與一個顛覆東晉王室的人關係密切，在這種情況下要說他是忠於晉室，

實際上是有衝突的。我懷疑可能有這個原因，所以對這個情節當初人們談的不太多。近代學者根據各種材料，包括陶淵明本人的詩，基本上已經推考明確，陶淵明在桓玄手下做事。

大概在隆安二年，也就是 398 年，當時荊州刺史殷仲堪和青、兗二州刺史王恭一起對抗司馬道子，當時朝中攝政的是司馬道子。結果劉牢之反戈，劉牢之是北府兵的重要將領，早先淝水之戰抵抗前秦的非常重要的人，當然他在歷史上看起來是一個反覆小人，所以他倒戈使王恭兵敗被殺，當時桓玄因為這次衝突，成為江州刺史，大約是在 398 年。第二年，399 年他把殷仲堪滅了，400 年他成為荊州刺史，荊州刺史又是因為之前他的父親桓溫，他沿著他父親的路、控制荊州，桓玄的背景大概是清楚的，陶淵明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入他麾下，在桓玄底下做官。很可能的情況是，桓玄先在 398 年成為江州刺史，399 年打敗殷仲堪，很可能在這個時候，陶淵明就到桓玄幕府裡面。因為他是江州刺史，是陶淵明所居地的主宰人物，而桓家和陶家實際上有很密切的關係。

陶淵明最主要的有幾首詩，400 年的詩〈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從都」當然指當時的健康，因為遇風而在這個地方停下來。這首詩有兩首，第二首前面說的非常清楚：「自古嘆行役」，他是有責任在身的，什麼責任呢？因為規林這個地方在潯陽，在陶淵明的老家附近。這首詩現在的解釋基本上是詩人行役，到了都城建康，之後返回向西走，到了潯陽，規林這個地方在潯陽。詩中說：「延目識南嶺，空嘆將焉如」，是在長江南望，規林

恐怕在長江岸，向南可以望到故鄉。這首詩可以確認的是：規林在潯陽的北邊，他從建康行役，執行了一定的責任，履行職務之後向西走；向西走後沒有回家，是經過家鄉，停在規林，南望潯陽，要再向西走去荊州，當時桓玄是荊州刺史。

還有一首詩是〈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辛丑年是第二年，隆安五年、401年，詩裡面又出現「懷役」——「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從詩題理解他應該是休假，回江陵就是去荊州，所以夜行塗口，塗口是在武昌附近，路過塗口做了這首詩。銷假返江陵，就是回到擔任了荊州刺史的桓玄府中。這在陶淵明的詩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近代學者都有很仔細的分析。大概在隆安五年，陶淵明當時任荊州刺史的桓玄幕府裡，所以可以肯定隆安五年之前的兩到三年，即400到401年，他肯定是在桓玄幕府裡。當然可以推測更早，桓玄任江州刺史滅殷仲堪之前，他已經在江州跟了桓玄，那就可以跨三個年頭。而且根據隆安四年這首詩，他為桓玄擔任入京的使者，因為他是入京還，停在規林。

這次入京是做什麼呢？逢欽立有一個大膽的推測，這位學者非常敏銳，雖然我引述他的觀點，但不代表我認同他的觀點。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推測，他認為陶淵明這次為桓玄入京的使命正好是上疏求討孫恩。當時孫恩陷會稽，在399年，所以陶淵明400年到京城去，為桓玄到建康向朝廷陳命。如果這樣，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因為瞭解當時政治格局的話，荊州有所舉動，理由都很堂皇，但事實上都有政治目的。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就是他想北伐，



像桓溫的時代就是這樣，北伐他就可以動員他的軍隊，向北邊去，事實上當時中央非常緊張，當時他說要討孫恩，就是要帶著部隊沿江南下，更是非常緊張。當然這個事情最後沒有實現，當時桓玄並沒有帶著軍隊下來討孫恩，但是在歷史學家的眼光裡面，桓玄是有機會可能帶著軍隊向下游來。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陶淵明赴建康擔任的還是頗為重要的使命，因為這跟桓玄整個政治佈局是有關係的。陶淵明最後離開桓玄不是一走了之，是他母親在冬天去世，所以離開桓玄，是一個外在的事件，所以他的〈祭程氏妹文〉中說得很清楚：「昔在江陵」，他知道他母親死訊是在江陵，是在荊州，在江陵桓玄荊州刺史門下得到母親去世消息，所以回到家鄉。

回到家鄉後，到第三次出來任職走上仕途，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東晉晚期政事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簡單的講，首先是 402 年，晉安帝下詔罪桓玄，桓玄就率軍東下，劉牢之這時候倒戈靠向桓玄，桓玄順利攻入建康，殺司馬元顯，總攬朝政；403 年篡晉，改元建楚；404 年年初，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劉裕收羅原本劉牢之北府兵的力量，把桓玄打敗。當時劉裕為鎮軍將軍，雙方在潯陽附近有戰事，把桓玄擊敗，桓玄就繼續往西跑，之後被殺。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我們是陶淵明，住在廬山腳下的潯陽，實際上整個驚天動地的政治軍事現實的活劇就在眼前上演。大家可以想像，荊州在中游、建康在下游，他在潯陽江邊，他可以看到桓玄的軍隊先往建康去，進城，殺司馬元顯，篡晉建楚，而後劉裕把他打敗，追擊過去，在潯陽戰鬥，把他殺了。很多學者對這事是有考慮的，但如果

這麼一想，陶淵明真的是目睹這個驚天動地的大變局。而後劉牢之的兒子劉敬宣，擔任建威將軍、任江州刺史。

在這過程當中特別有意思的是，陶淵明留下了兩首詩，一首是〈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個鎮軍參軍就是擔任鎮軍將軍的劉裕。這很有意思，劉裕他攻擊桓玄的時候，他做了劉裕的鎮軍參軍，當時劉裕在京口，曲阿與之相去不遠，所以他到劉裕那裏去擔任參軍。當然在劉裕那邊擔任參軍的時間非常之短，因為這首詩是在 404 年做的，但 405 年年初，他又留了一首詩下來，〈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這個建威將軍是劉敬宣，所以他是一年的時間先是劉裕的參軍，之後桓玄被擊敗，第二年的年初，我們看到的他已經是劉敬宣的參軍。劉裕把桓玄擊敗之後，劉敬宣當時有他的考慮，所以他上表自求解職。有的學者認為陶淵明他這次「使都」，經過錢溪，錢溪在安徽，實際上就是為了送劉敬宣自求解職的表，當然這是學者的推測。我真正關心的地方是他第三次和第四次做官的經歷非常之短，在一年之內，先跟劉裕、後跟劉敬宣，劉敬宣自求解職之後，他當然也就沒有當官。我估計他之後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園。

回到家園之後，我們就可以看〈歸去來兮辭〉序裡面所講的，說自己很窮，為了公田之利也為飲酒，家叔為他謀了一個這樣的職位，說的非常清楚是為了俸祿而去的，但只在義熙元年的八到十二月，只做八十幾天的彭澤令就棄官而去，這是他第五次，完全終結了他的仕途，隱居田園之中。

綜合前面學者的考察，簡單概括他一生的仕途經歷是五次，第一次江州祭酒很短；第二次在桓玄荊州刺史那邊，大概兩年到三年；第三第四次是在一年之內，在劉裕和劉敬宣那邊做參軍；最後是彭澤令，八十天，基本上是這樣的情況。上述五次出仕當中，桓玄和劉裕那裡的經歷與當時歷史大動向最有關聯。試想：陶淵明當然和謝靈運不一樣，謝靈運直接介入劉宋初期的政治，他一生也是政治格局決定的，陶淵明沒有那麼重要，但可以想像，那時東晉覆滅的兩個最重要的人物，那時代最強硬的兩個梟雄，桓玄和劉裕，他都在他們底下做過參軍，都是親見、為他們服務過。所以這絕對不是我們一般想像的，一個田園詩人、一個超然世外的人物。如果像遼欽立先生他們的研究，認為他有介入，包括他替桓玄為了孫恩的事情上表，都是陶淵明去做的話，那這是非常驚人的，是實際上參與到桓玄的行動裡面，所以我想他是有政治經驗、政治經歷和政治接觸的。

## 二、家族

前面講的是當時陶淵明的仕途，接下來想講他的家族，從家族的角度觀察，非常重要，因為中古的六朝時代，一個人的政治出路、仕途，很大的程度上是被他的家族所決定的。如果你是高門，那一出來就是大的官職，可以看得到一路升職的可能性；如果是低等的，那就是沉淪下僚，那是非常清楚可以看出來的。包括信仰，六朝時候的信仰我相信和唐宋是很不一樣的，唐宋以下的文人信

仰，基本上是一個個人選擇，和現代社會比較類似。六朝的時候很多是家族信仰，雖然也是有個人選擇，但實際上，我們可以從他的家族信仰、家學裡面觀察到他的思想取向。家族這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來看家族的情況。

這裡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跟桓玄的關係，所以下面我想講他跟桓玄關係的重要性。從家族來講，當時桓溫佔據荊州的時候就有不臣之心，這裡舉一個《法苑珠林》裡面《冥祥記》的故事：大司馬桓溫，晚年非常信奉佛法，他是飯僧、供養僧尼的。有一個比丘尼，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從遠方來，就投到桓溫這裡，桓溫供養她。桓溫對她非常之好，但是這個比丘尼每次洗澡的時候，時間很長，桓溫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洗澡時間這麼久，所以他疑而窺之，結果一看，看到比丘尼赤身裸體，拿著刀把自己的肚子破開，「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把自己大切八塊，桓溫看到「怪駭而還」。等比丘尼出浴室之後，「身形如常」。桓溫問她怎麼會這樣？比丘尼說「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意思是如果你犯上作亂，就會有這樣的結果。這時候桓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當然桓溫最後並沒有實現奪下晉室天下的事情，但這是一種佛教的解釋，雖然志怪傳奇小說裡面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但具體的事實未必真，故事透露出來的情可能是真的，一般人的觀念、情感可能是真的。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來，桓溫當時確實有不臣之心，而桓溫沒有實現它，當然歷史學家有解釋，如果有興趣我建議大家去看北京大學田余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一書裡面討論桓

溫的部分，雖然很多推考，但非常精彩。桓溫這個人做事穩紮穩打，進兩步退一步，非常穩妥地推進他要做的事。

桓玄基本上繼承他父親的路線，先是江州，然後是荊州，他給予中央非常大的壓力。陶淵明這時候出來在桓玄手下做事，且在桓玄和朝廷中間擔任特使的話，那實際上扮演的角色會是非常重要的。若如逯欽立推測，詩人是為桓玄上疏討孫恩事奔波，那麼這後面隱含著桓玄期望由此東下的政治企圖，陶淵明至少受到桓玄相當信任的。這當然是推考，但我想是有道理的。

桓氏家族的經歷，田余慶教授《東晉門閥政治》中有很精彩的推考，片斷的史實，經由田先生綴合在一起，調動了充分的推理和想像。他認為桓氏家族往上推，是東漢大儒桓榮，是東漢大族，但經過曹魏時的鬥爭，桓範被殺，之後家族勢單力孤，因而政治上被打壓下去。桓範被殺是因為他站在曹魏一邊的，所以司馬氏最終三家歸晉，對於桓家是壓抑的。桓彝渡江，晉室東渡之後，桓彝是有功之臣，他的兒子桓溫權傾一時，最後桓玄代晉立楚，當然實際上時間非常短，桓氏大概是這樣的過程。特別想講的是，桓氏雖屬東漢以來的大族，當時曹魏和司馬氏爭奪時是受到壓抑的，但是後來桓彝到桓溫、到桓玄，是興起的態勢，但在當時還是受到高門世族鄙視，被人看不起。大家都很熟悉的《世說新語》的例子：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

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

王文度，就是王坦之，王坦之當然也是很有名的人，王坦之為桓公長史，在桓溫手下做官，桓溫跟王坦之說希望把你的女兒嫁給我的兒子，王坦之說我要問一下我的父親，就是王藍田。回家之後，王藍田非常喜歡這個兒子，雖然已經長很大了，「猶抱著膝上」，因為那時候還是跪坐，我估計應該是靠著，可能是靠著大腿坐著，王坦之就跟王藍田說桓溫要求我女兒跟他兒子結婚，結果王藍田大怒，把他推開，「排文度下膝」，問自己的兒子說你是不是發癡了？是不是害怕了？因為他在桓溫底下做官，就問他：你是不是害怕桓溫？他說「兵」，兵在那時候是很賤的，桓氏起來是因為他有武功、他有軍功，所以他說「兵，哪可嫁女與之」，兵家怎麼可以把女兒嫁給他，我們王家是什麼身分！所以王坦之就回去跟桓溫講「下官家中先得婚處」。這顯然是很拙劣的推辭，本來說我回去問問，後來說我女兒已經嫁人了。桓溫就說我明白了，是你的父親不同意。這是很有趣的事，但可以說明的是，在王家真正高門貴族之中，桓家是什麼身分，就是「兵」，王述以桓溫為「兵」是強烈蔑視的表現。

在這一點上，是跟陶家有類似之處的，陶家講起來比桓家地位更低，但是在相對真正的高門貴族眼中看來，他們實際上都是很低

賤的。在《世說新語·方正》裡面，講王脩齡很貧困，而陶範——陶範是陶侃的兒子，陶侃是陶淵明的曾祖父，當時是做大將軍、有功的，是東晉時推升陶家達到政治權力頂峰的人物——當時送了一船的米給王脩齡，王脩齡不收，他說如果我沒有東西可以吃，我去找謝仁祖索食，我王家沒東西找謝家，我哪裡要你陶家的米！「不須陶胡奴米」，就是說我們王家與謝家才是門當戶對的，就是看不起陶家。余嘉錫作箋說：「疑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陶侃）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最值得注意的是，《世說新語·文學》的九十七條講袁宏，袁宏是當時很有名的文人，他作〈東征賦〉，〈東征賦〉裡面沒有提到陶公，就是陶侃，而胡奴，就是陶範，就因為袁不寫自己的父親，「臨以白刃」，拿刀指住袁宏，說「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我父親很有功，你寫〈東征賦〉怎麼不寫我父親？袁宏非常窘迫，在〈文學篇〉裡面說袁宏他能出口成章，所以他就說「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隨口就來，胡奴就放過他了。〈文學篇〉裡面這麼一個故事，事實上也表示在袁宏這些人眼光當中，對陶侃的蔑視，根本不寫。有意思的是，劉孝標注，引了《續晉陽秋》，這是很重要的一本史書，《世說新語》劉孝標注經常引到，這個故事卻發生在桓家，當時袁宏是大司馬的記室參軍，寫了〈東征賦〉，把過江的名望都寫到文中。當時桓溫在那哩，袁宏卻說「我決不及桓宣城」，決不寫桓溫的父親桓彝，這代表也是一種看不上的態度。當時伏滔在溫府，在桓溫

底下做事，和袁宏是不錯的，「苦諫之」，建議他還是要寫，袁宏就笑而不答，不肯寫。伏滔偷偷告訴桓溫，桓溫就非常惱火，「甚忿」，但是袁宏是一時文宗，要顧及豪傑，又聽說這篇賦很有名，所以不想鬧出太大的風波。有一次游山、喝酒，回來的時候桓溫讓袁宏跟他一起坐車，別人都覺得很緊張，但車走了數里，桓溫問：「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袁宏答說：「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我不敢寫。桓溫說，如果你要寫的話會怎麼寫，袁宏就出口成章「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等等，桓溫就「泫然而止」，被他感動，就不加害他了。

劉孝標引了這段之後加了案語，「二說不同，故詳載焉」，後來余嘉錫先生認為是「二者宜皆有之」，我想這是兩種態度了，一種是張冠李戴，傳錯了，或許是陶家的事，或許是桓家的事；另一種是照余嘉錫先生的講法，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我就暫且迴避，這對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都有這樣的說法，不管是正是誤，都代表著桓、陶兩家在高門世族的視野中，彼此的地位是差不多的，都是受到貶抑的。

在這種情況下，陶淵明家從曾祖開始，為國家勳臣，到詩人這代，陶侃生了陶茂，陶茂生了陶逸，陶逸生了陶潛，陶潛的父親當時是什麼名字其實是不知道的，因為當時陶家敗落，一直到宋人給他做注的時候，提到叫作陶逸。這實際上還有爭論。像是龔斌先生做《陶淵明集》校箋，他就調查族譜，認為是陶敏。雖然還不清



楚，但至少說明陶淵明的父親地位非常低微。不過雖然已經敗落了，但東晉以來也算是勳臣之後，所以陶淵明的自我認同是以祖先為傲，包括他的〈命子詩〉裡面，都有這樣的表示。但實際的處境是和桓家相似，為高門世族所鄙視，更進一步看，他和桓玄的立場有更多值得注意的重疊和複合的地方。

陶淵明一生仰慕的家族人物中，除了曾祖陶侃是大將軍，還有外祖父孟嘉，這也是非常有名的人物，陶淵明曾有寫到，陶潛為孟嘉專門寫了一篇傳。當時陶家的地位比較低，人家罵他是「獬狗」，是南方的蠻族。陳寅恪先生認為不一定是蠻族，但他出生的地方，確實有很多獬人聚居，而且以漁獵為生，是比較卑微的。可是孟氏是武昌地方的望族，是當時的名士，陶侃第十個女兒嫁給孟嘉，可以說是當時地方強人和地方有名鄉紳的結合。之後，他們生的第四個女兒，就是陶淵明的母親，所以孟嘉是他的外祖父。孟嘉最有名的故事，後來在詩文裡面都作為典故用的，在陶淵明這篇傳裡都可以看到，而且所有都是孟嘉發生在桓溫幕府裡面的事情，都與桓溫有關。最有名的故事是「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誇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說他很喜歡喝酒，但是「逾多不亂」，桓溫就問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他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曾經問他「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這都是非常有名的應對，都是發生在桓溫跟孟嘉之間。這篇傳按照逯欽立先生的意見，是隆安五年，在陶母孟氏去世

以後，為他母親回家守孝那段時間寫的。這其中很有意思的地方，揚州大學顧農教授有些特別的看法，他提到傳裡面有一段話，寫劉耽和孟嘉兩人曾經一起在溫府。陶淵明的從父陶夔就問劉耽，那時候孟嘉大概已經去世了。說如果孟嘉還在的話，現在是不是已經做公了？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所以「為時所重如此」。這段話很有意思，直接講到陶淵明的外祖孟嘉在政治上可能的前途。陶淵明的從父，就是父親的兄弟陶夔，曾經問過當時一起在桓溫幕府裡面和孟嘉同事的劉耽，如果孟嘉還活著的話，是不是政治上會非常通顯，劉耽回說當然。這段話寫在這裡是什麼意思？顧農說：

陶淵明早不為孟嘉立傳，晚不為孟嘉立傳，恰恰在桓溫之子桓玄繼承父志奪去中央政權最為得意之時來寫這份傳，並且強調自己的外祖父與桓氏家族的密切關係，要說一點潛臺詞都沒有大約是不合實際的，其中很可能埋伏著深刻曲折的政治計算。

確實他離開桓玄那裡回到家鄉，然後政治局勢就發生了很多事情，他在這時候寫這篇傳，會讓人浮想聯翩。這麼推理或許有過度之嫌，但即使有過度之嫌，考慮到他在仕於桓玄的門下因母喪而離開，確實逗人浮想聯翩。

我想如果平心靜氣來看，陶淵明到桓玄那裏做參軍，實際上是有很多因素的。一個是荊州的背景，陶侃是荊州刺史，他在當地經營，雖然家在江州潯陽，但荊州也可以說是他老土地；陶淵明的外

祖父孟嘉則是荊州武昌地方的望族，在桓溫那裡做過事，關係密切，而且有很多風流韻事傳下來；桓溫的兒子桓玄有權有勢，做了江州刺史、做了荊州刺史，他們都是老相識，我相信他們互相之間都是知道的。陶侃在桓溫之前是荊州刺史，後來孟嘉在桓溫底下做事，再到孟嘉的外孫陶淵明到桓玄這邊做事，這很自然，他們兩家有家族聯繫，這是家族的情況。

### 三、信仰

第三個我想講的是他們的家族信仰、思想，陶淵明和桓玄在思想上有很多可以一起討論的地方。之前講政治、講到他們的家族關係，這裡講他們的信仰。他們接受的是一般士族教育，有相似的文化教養，陶淵明自己講是「遊好在六經」，有儒學傳統經學的訓練，「詩書敦宿好」，對詩書非常熟悉和瞭解；而桓氏當然也是以儒學立身的，因為他們家族最早往上推，在東漢的時候就是儒學世家。

要談桓玄乃至陶淵明在思想信仰方面的關係，得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慧遠。桓玄跟慧遠的關係實際上是非常密切的，慧遠有很多佛學論文、議論留下來，實際上都是因為桓玄，如果沒有桓玄，慧遠未必會留下那麼多的文章。陶淵明跟慧遠的關係實際上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他們是認識的，後來的傳說，恐怕都是中唐以後的傳說，在當時是沒有的。但是陶淵明跟慧遠之間肯定是互相知道的，他們之間有共同的朋友。桓玄跟慧遠的關係特別密切，一個

佛學史的研究者都會特別關心慧遠，都會仔細地去分析慧遠的宗教實踐、宗教信仰，這麼做追求的目的是，把慧遠在佛教中的地位確認起來。這當然做得很好，但我的著重點不在這個地方，我著重的是反過來看這個問題，看桓玄跟慧遠之間的意見分歧。從慧遠的文章裡，看到慧遠反對桓玄的觀點，來確認桓玄是怎麼樣的思想取向。可以看到桓玄這樣的思想取向，實際上和陶淵明很相似，所以我想論證的是：陶淵明跟桓玄有共同的思想取向。

桓玄基本上是一個儒學的立場，我用了《高僧傳·慧遠傳》，這其實是非常普通的材料：

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

「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就是前面講 399 年，桓玄當時是江州刺史，要討荊州殷仲堪、殺殷仲堪。之前，桓玄實際上和殷仲堪是很熟悉的人，他們一起談玄。桓玄在發兵之前，經廬山，要去見慧遠。「要遠出虎溪」，希望他出來，可以跟慧遠見面。「遠稱疾不堪」，說自己身體不好，桓玄就自己進山。左右人跟桓玄講：以前殷仲堪也進山，見過慧遠，你還是不要去。你現在帶著兵要去打殷仲堪，殷仲堪以前也禮見過慧遠，你就不必進山了。桓玄也是一世

梟雄，非常厲害，說「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說殷仲堪沒幾天好活了，見到慧遠之後，「不覺致敬」，非常崇敬，但還是要問難。桓玄是個非常有學問的人，就問他：「不敢毀傷，何以剪削？」和尚是剃髮的，這用的是《孝經》裡面的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慧遠也很厲害，這個人原來也是讀六經的人，所以他馬上用孝經的下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回答「立身行道。」這兩人的話就是上下文都不要，關鍵詞出來就可以，《孝經》有「不敢毀傷」這個說法，他就說「立身行道」，是為顯揚父母，是孝之終也，這非常精彩。「玄稱善」，桓玄就覺得慧遠真是有學問，當時名士就是一來一往，在一兩句之間學問就顯現出來了。

這是有趣的地方，但可以看到的是：兩個人都是用儒家的經典。對桓玄來講，他對佛教的質疑是站在儒家立場，後來桓玄很看重慧遠，他寫信說「夫至道緬邈」，天下大道、佛理是非常幽深的，一般人是求不到的，你現在把六親都棄掉，剃髮出家，也不是人人都做到，最後恐怕會是邯鄲學步，然後說「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這也是孔子的話，「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求佛道「皆是管見，未體大化」，大化就是從易學以來基本的概念，「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勸他不要做和尚了，「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時間不長，你趕快迷途知返吧！慧遠當然是不答應，也有回應他的話，這都非常有意思。以我的推考，桓玄給慧遠信，讓他罷道，應該是在荊州時期寫的，而很有可

能陶淵明是知道這個事情的，他在幕府裡面嘛。我們以前考慮陶淵明跟慧遠的關係，只考慮一個在廬山上，一個在廬山下。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桓玄跟慧遠有很多玄學的論辯，和陶淵明非常近似。他批評慧遠的佛學主張往往採取玄學自然之說。《弘明集》卷五，〈明報應論〉裡面，有一個「答桓南郡」，這篇文章基本上可以確定是回應桓玄的問難。我覺得，要了解桓玄的想法，我們不妨不去討論慧遠怎麼講，而是回過頭來看桓玄怎麼講，也就是看慧遠文字裡面所回應的那些質疑是怎麼講的。桓玄的態度很有意思，他說佛教是「以殺生罪重」，所以要到地獄。但是他表示很懷疑，他說「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但是如果殺生，「滅之，既無害於神」，因為本來就是因緣聚合，你殺生，這有什麼罪呢？他意思說本來就是一個虛空的結合，四大因緣聚合，殺之也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怎麼殺生會是這麼大的罪呢？他有很多這種類似的話。這些在《弘明集·明報應論》中都有，〈明報應論〉是有問有答，他提出疑問而慧遠給出回應，將慧遠的回應放在一邊，只考慮「問」，便是桓玄的觀點。包括他說「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人都有情，對人有情這個私戀之惑，要怎麼做？他說應該要用達觀的方式，「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這句話對人情的惑，他跟佛教一樣承認人有迷惑、有偏執，但應該怎麼處理？他的辦法是應該要達觀，這是道家說法，要用達觀的方式來化解、來應對，怎麼可以說因為這個人迷惑、迷執，所以最後

要施以報應呢？從「朗以達觀」可以看到，他的立場跟佛教談報應、慧遠的原則是不一樣的，主張以「達觀」對治情戀執著，反對談報應。

他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話，我這裡就不做太多展開。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慧遠的一篇文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共有五篇，實際上是五篇文章合在一起。我看了五篇文章，非常有意思的是：這些文章我相信他是在不同時間分別寫的，而且有一些文章他論辯的對象就是桓玄。《弘明集》卷十二有一篇〈答桓太尉書〉，這篇文章裡面有一段話，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有作為批評對象提到，當然裡面沒有桓玄的名字，但這兩邊的話是一致的。我想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討論對象就是桓玄。但這幾篇文章是不同時間寫的，最後完成時間倒有一個非常準確的時間，慧遠也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在元興三年，把它們集成：

晉元興三年，歲次闕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輟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天子蒙塵」，實際上就是指桓玄代晉立楚，「人百其憂」，所以「因述斯論」，把五篇合在一起。我覺得〈沙門不敬王者論〉各篇是在不同時期寫的，但最後集成一篇，是在桓玄代晉而立楚，結果又被劉裕打敗，在這個過程中集結起來的。所以覺得慧遠也是個政治和尚，因為他之前寫是分別寫，沒有「集」，他什麼時候結集也是有道理的，裡面還講「天子蒙塵」、「人百其憂」，當然這也可

能是我的過度引申。

這裡面他最重要的一段話是〈沙門不敬王者論〉第二篇「出家第二」裡面，有非常清楚的顯示，這段話的意思是什麼呢？「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第三篇就是「不順化以求宗」，這是主旨，實際上就是說順化是沒有辦法求宗的，所以「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佛教認識到人生之患累在於人身，因為有人身，所以有患，老子也是這樣講，人之大患，在吾有身。他講人的患累在於人之有身，所以不可以保養身體，因為本身身體就是患累的來源，保養身體就是保養患害的根源，所以不可以用保養身體的方式來止息患累；而萬物之生由於自然之化，故此便不能順隨自然之化去求得最後的宗極，這是慧遠的觀點。存身來保養自己，是培植人身之患害。因為人生是自然大化的一個過程，所以順隨大化是不能求到宗極的，宗極就是人生根本的究竟。「宗」就是宗極的真理、真諦，謝靈運寫〈與諸道人辯宗論〉，是宗極的真諦，所以說不能珍重物質之資和養生之厚。慧遠展示給桓玄的是非常關鍵的分歧，這段話是慧遠對桓玄的批評，他展示給桓玄非常關鍵的分歧在於「順化」與否，桓玄主張順化，但對慧遠來講是反對順化，「不順化以求宗」，順化是不能求宗的，不順化才能夠真正把握宗極，順隨大化流行是把握不到宗極的。關鍵的分歧是：一個是主張順化，慧遠則是非常明確反對。不順化以求宗，「不存身」、「不順



化」是慧遠的主張，而所謂「順化」這點不僅是桓玄質疑慧遠的要點，也是陶淵明思想的核心。如果去看陶淵明，他講「縱浪大化中」，是自然順化的觀念，「縱浪大化中」是陶淵明基本的人生態度，也是他人生樂處的根本，〈歸去來兮辭〉中講「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都是講人的生命應該是順化的。

基本上想要講的就是：慧遠很多討論基本上是與桓玄進行爭辯的，而其中很重要的分歧，桓玄是用儒家和玄學觀念來質疑慧遠，前面舉了很多例子。再從〈沙門不敬王者論〉裡面看，桓玄主張順化，這是玄學的觀念，而慧遠反對順化、認為不能順化，才能夠求到宗極，而順化這個觀念又是陶淵明非常重要的核心。顯然，在「順化」這一點上陶淵明和桓玄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玄學的信奉者，而和佛教徒的慧遠有差別。從與慧遠的思想關係，大致可以說陶淵明與桓玄在思想信仰上有相當接近之處，而結合前文討論的陶、桓兩家的家族關係，尤其是當時社會高等世族眼光中的地位，兩人之間應該有相當切近的基礎。

#### 四、歸隱

在前人的考證之下，我從家族信仰進一步推估，陶淵明和桓玄的關係非常密切，相比之下，陶淵明對劉裕觀感則明顯不佳，而且他第三次出仕時間非常短，在劉裕那邊做參軍為時非常短，至久不過一年，我們不知道中間經歷了怎麼樣的曲折，但是他對劉裕一直是不以為然的。以前很多討論，對陶淵明基本政治立場，他的態

度，包括他人生選擇，說他維護東晉，反對劉宋篡晉等，這裡面可以提出很多很多他對劉裕很多負面的看法。

包括他的一首詩〈贈羊長史〉，劉裕北伐進佔長安，當時是大家很高興的一件事情，北伐成功，當時江州刺史派人去祝賀，陶淵明就寫一首詩。這首詩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一方面講「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他認為重新光復北方，南北統一了，應該過去；但下面講說「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經過商山為我看看是不是隱士。後來很多注家搞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太奇怪了。先是講值得慶賀，後來又說避世，前後連不起來。注家就結合到後幾年劉裕代晉的史實，用詩人對易代有敏感，認為陶淵明有避世的感覺等等，來做出解釋，這樣的情況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我這裡引一個袁行霈先生的研究，也是很有意思。袁行霈的研究是他的判斷，我引他是因為對我的看法有幫助。他說陶淵明入宋以後的態度與很多人是不同的，他雖然歸隱，可是和官場上很多人物還是有接觸。他「引為知己的是顏延之和殷晉安，可以接近的是王弘，反感拒斥的是檀道濟」，對陶淵明有所了解的人應該都知道。最主要的是，他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區別，是因為他們跟劉裕的關係「存在疏遠親近之別：遠劉者，淵明與之近；近劉者，淵明與之遠」，這些交往的人物裡面如果和劉裕關係好，陶淵明就跟他保持距離；如果跟劉裕關係遠，陶淵明反而跟他親近。當然這是袁行霈先生的看法，我把他拿過來是想說，基本上陶淵明對劉裕的觀感是不好的。

下面再想像，如果涉及到政治現實、世代變局，陶淵明和桓玄的關係、陶淵明跟劉裕的關係，一比較下來，陶淵明跟桓玄是密切的，跟劉裕則遠的多。陶淵明跟劉裕的隔閡可想而知是非常顯著的。在信仰和思想方面，劉裕出身寒素，基本上屬於低等士族，陳寅恪先生、北大的祝總斌先生都有論文。他沒有任何門閥家族的背景，沒有深刻的教養、傳統跟認同，他崛起完全是因為他的武力和功業。在世族的意識上，陶淵明雖然比桓氏要低，但是他還是有家族意識，會講家族光榮，所以他更近於桓玄，遠於劉裕。

那怎麼解釋劉裕打敗桓玄時，陶淵明投到劉裕麾下作他的參軍？我想是因為在自身家族作為東晉勳舊的立場上，陶淵明或許更偏向晉室，因為他偏向晉室，所以對於劉裕碾平桓玄或許一時之間能認可，我也只能這樣解釋。在元興三年到義熙元年，入劉裕門下為參軍，多少表示陶淵明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劉裕在那一歷史時刻的作為。看上去好像偏向次等士族劉裕，但是之後劉裕漸行坐大，我想他是難以接受的。他對劉裕拒斥，我想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基於他勳舊家族的政治態度，二是雖出身單微衰落之家族而往往自負高門的文化立場。或也可以假設，陶淵明對於晉室，不單只是政治上的忠誠，而且具有世族勳舊複雜感受為基礎。我基本上想講的是，對一些過去陶淵明的研究，我覺得太多關注他是忠於晉還是不忠於晉，太關注他在政治上的選擇。從政治上加以考慮是有道理的，但實際上當時他們在政治上的選擇不會是唯一，家族的利益有時候會遠遠超過於政治選擇。很多都是這樣，謝靈運謝家實際上在晉宋易

代之際是多面投注的，有些在這邊，有些在那邊，包括劉宋初期的政治鬥爭當中，謝家也是多元投注的。所以當時一個人的選擇，不宜簡單化地理解為一個絕對的單向度的選擇，前面講到了信仰的問題、家族的問題，或許除了他政治的選擇之外，實際上有可能是有文化上或是家族立場上的選擇，是多層面的。

晉宋之際的大變局，就篡晉者言，桓玄和劉裕都是篡晉者，但是從世族桓玄到低級士人劉裕，是一個時代轉型的體現。晉的時代基本上是一個貴族的時代，或者照陳寅恪先生講的，是東晉門閥政治的時代，就是高等貴族如王、謝家族掌握很大一部分政治權力的時代，是王、庾、謝、桓等幾個大家族和司馬皇室聯合控制政治。到了南朝以後，皇權重新伸張，但是那些基本上都是屬於下一等的貴族，不是高級貴族，包括宋的劉裕、齊梁的蕭氏等，事實上在統治階層，皇室的文化身份和地位是一種下降的趨勢。

從大的歷史局勢來看的話，從世族桓玄到低級士人劉裕，這是一個時代轉型的體現。陶淵明作為晉之勛舊的後裔，所受的教育和早年的實踐，都是要入世有所為的。而他與類似階級的桓玄關係被迫中斷，是因為母親去世；而在戰爭當中，劉裕打敗了桓玄，他面對劉裕打敗桓玄的格局，只能面對勝利者，但劉裕對他來講，從家族感受上、貴族意識上、從信仰的角度來講，都是不投緣的。在這兩位當時叱吒風雲的人物之間，有世族和低等士人的不同，詩人身當此歷史轉型的關頭，對新的歷史動向是不合契的。所以陶淵明於世族到低等士人的轉變，他當然是無奈的，但是以勛舊家世故，於

篡晉之趨向亦難隨附，所以構成雙重的不合時宜。由此而言，則陶淵明退出官場，固有家族地位不致顯達之可能性及對於亂世之厭倦，則眼見寄奴之強大，不奈世間階級與風習之轉趨，也是觀察陶淵明退隱田園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大歷史背景。

我是這樣想的，因為陶淵明家族地位本來就不高，從他做江州祭酒開始，他在政治上就沒有辦法進入核心，跟謝靈運這樣的詩人是不同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他對亂世的厭倦；還有一個要考慮的是，他投到劉裕這件事，他一方面是勳臣之後，對篡晉當然不會熱烈支持，另一方面他認為劉裕身分這麼低，沒有共同文化、沒有共同信仰。最後劉裕坐大，和劉毅之間有衝突。有材料說，劉毅和劉裕爭奪的時候，當時很多人依附劉毅、而不依附於劉裕，劉裕軍力強，非常能幹，是一世雄傑，主要依靠北府兵的力量；而劉毅更多的是得到文化人的認同。所以可以看到，謝靈運一開始就是跟著劉毅，但是後來劉毅被打敗了，他才歸到劉裕下面。劉裕對謝靈運是很不錯的，沒有特別迫害，但是劉裕、劉毅兩個人是敵手，我把你打敗，把人收過來，謝靈運這樣的人作為一個詞臣、一個文臣是可以的，但是要進入政治中心是不可能的。他站在劉毅那邊，而劉毅被劉裕打敗，就決定謝靈運在政治上捲入重要的政治鬥爭當中，要新的皇帝給你實權，是沒有可能性的。當時人的看法，劉裕和劉毅這兩個人，劉毅是比較有文化的，劉裕是以武力取勝，二人有文武之別，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回過來說，陶淵明對於自己的歸隱田園有種種自我詮說，陶淵

明有很多文章都在講，我為什麼要歸隱、歸隱的理由是什麼、我這樣是有道理的、是符合我的天性的。這個部分從自然本性立說，是承莊生玄學之緒，固然是其學問思理有以致之，實際上亦是現實中挫敗的人生經驗的轉化與提昇。這意思是，像上一次講座時有老師和同學都提到的問題，跟〈與山巨源絕交書〉有類似之處，對嵇康來講，他之所以做出和司馬氏集團保持距離或對抗的姿態，肯定是有政治理由，包括山濤出仕、跟山濤絕交，都有他的理由，但是在文章裡這個理由不能直說，也沒有辦法直說，所以文章核心是從莊學的觀念講「循性而動，各附所安」。陶淵明恐怕也是這樣，我們恐怕太依循陶淵明為自己歸隱所塑造、編織出的形象、理由，我想這是陶淵明對自我的轉化和提升，塑造了他當時現實和歷史上的形象，實現了他的自我完成，我們依循這樣的形象，認為他是一個自然詩人，天性自然的人，但分析一下，他是目睹了晉宋之際大變化的人，他跟當時最重要的兩個權力人物——桓玄跟劉裕都有切近關係，他跟桓玄有那麼多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兩年在他底下做事的經驗，可以想像他肯定是百感交集，有很多非常複雜的具體的經驗和感受。最後他選擇退隱，退隱之後，他和嵇康一樣，要表述這個理由，他用道家、莊子的自然人性、質性自然，用「少無世俗韻，性本愛丘山」來包裹，建立他的一套話語、確立他自己。我認為他的文學對他的現實經驗來講是相反的，實際是一個轉化。他現實經驗是失敗的，但他用他的文學和玄學義理來轉化、證明自己，這一點陶淵明是成功的。

還想講的一點是，如果要對陶淵明做具體研究的話，現在有很多講他的田園詩和勞作。但我是這樣想的：陶淵明最初退隱田園，最後他經歷了很多困苦，不是他最初歸隱田園時所想到的，所以細緻地看陶淵明如何面對漸漸來臨的困窘，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基本上在田園生活中也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他生活有很多問題。他差不多四十多歲歸隱，活到六十出頭，所以慢慢地他的困境來臨，可能飢寒交迫，要想辦法去應對。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後面的困苦生活，不在他當初的預想裡面。看〈歸去來兮辭〉，可以知道他當時的生活是可以應付的，他有稚子迎門、也有僮僕，所以他早期的態度更能表現他要用一套莊學的話語來為自己的選擇做辯護的情況。農事的艱難，陶淵明是有認識的，但並不是他歸隱當初所預期的。

歸隱的最初，我們可以看到陶淵明歸隱初期那些津津樂道的文章，他那些詩文其實是田園上的自然之樂，而不是田園上的勞苦，所以如果是「田」和「園」的話，他關心的是在「園」而不是在「田」，從〈歸去來兮辭〉裡面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他的詩我特別喜歡這一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代表他那時候的態度，田不是最重要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農夫，如果是真正的農夫那還了得嗎？「草盛豆苗稀」那要急壞了。

所以對他來說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園，在園中他覺得他實現了他自己。他最後講「衣沾不足惜」，受到的種種困苦都沒有關係，「但使願無違」，有這個「願」就可以。

還有一個是陶淵明特別喜歡講鳥，像是「羈鳥戀舊林」；〈歸去來兮辭〉裡面也講「鳥倦飛而知還」；「結廬在人境」這首詩裡面也有「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等等。對陶淵明來講，鳥就是一個自然節律的象徵，什麼叫「鳥倦飛而知還」？什麼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呢？日出就飛出去，日落就飛回來，符合天地自然的過程，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陶淵明在政治上是有企圖和想法的，但差不多十年的經歷延續了種種挫敗，他認為與世不諧，不合時宜，所以他退回來。退回來之後他用一個理由講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用玄學、用莊學的理由來講，我這樣做是實踐我自己、完成我自然本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初期，他找到了田園裡面的「園」、找到了樂趣、找到了自我實現，而這個生活後來慢慢有了很多困難。陶淵明後來也非常了不起，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他真的努力去實踐。所以陶淵明非常重要，他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他是理論和實踐、知和行兩者之間都盡量要去做，因為觀念上、理論上的解決，對自己的說服也好、對別人的說服也好，這是一個理論，但是後來他要把這個理論堅持下去，要實踐、完成，陶淵明經歷了很多很多的困難，這是留待以後更詳盡討論的課題。

最後要講的是，這樣的轉化和提升，是陶淵明根據文字重新檢



點自己的人生，塑造自己的生命旅程，建立自己形象之成績。由此可知，當時歷史、政治之大關節中渺無分量之文人，在歷史過程中以文字構造自我和當下的意義，而自致不朽之成功。歷史上很多文人和思想家在當時是微不足道的，我上課講莊子的時候，常說莊子他真正活在什麼樣的時間是沒什麼可爭的，早五十年、晚五十年那都是沒有關係的，在當時來講有這個人、沒這個人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回過頭來看當時最有力的人今天完全可以不考慮，但是柔弱的人是可以轉化的，這也是柔弱勝剛強的一種轉化。我想這個提升，構成了陶淵明的「田園」在後世的主要意義。我們關心的往往不是那個具體的歷史情境，而是由此產生的精神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比政治更久長，而陶淵明的文字塑造了自己在歷史上的形象。

我花這麼多口舌講陶淵明現實的困境，最終不是僅僅要提出他曾有的現實困窘而已，某種意義上，由種種現實的困境展示，反而能更充分地肯定陶淵明後來轉化、提升的努力和成功。謝謝各位！

### 主持人陳逢源老師：

我們時間是差不多了，但還是想說，不曉得有沒有同學願意提問？

我很感激陳老師藉由以史證詩，以詩證史的方式，把仕旅、宗族跟信仰做縝密的分析，來形塑陶淵明詩裡面的特質。我想這是非常可貴的，因為從今天觀察，其實我們學校王夢鷗王老師，他的學

術成就很多方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法門，就是用小說來證史、用史來證小說，在唐人傳奇當中因此而開展。誠如剛剛陳老師所說，文學比政治更久長，陶淵明提升了他的文學趣味，這部分我也非常欣賞與關注。我自己覺得在北宋，一方面他可能就像《孟子》被提升了地位，一方面就像蘇東坡提升了陶潛的地位，他們都符合宋以後士大夫的心理思維，提供了我們一個心裡景仰的方向。

非常感謝陳老師藉由一個縝密的文學梳理，細密的分析，幫我們揭示了陶淵明的生命維度。我們再次感謝！第二場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的熱情參與。